

仙
縣
志
人
志

(二)

朱順佐

仙縣市歷史學會



绍兴贤人志

(二)

朱顺佐

绍兴市历史学会

目 录

越国著名政治家文种	1
越国“圣臣”、谋士范蠡	4
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	7
东晋地主阶级政治家谢安	9
唐朝诗人、越州刺史元稹	13
宋朝名贤、越州太守范仲淹	16
明代绍兴知府、水利功臣戴琥	20
明代修建三江闸的水利家汤绍恩	23
明朝著名心学思想家王畿	25
明朝诸暨知县、治水能人刘光复	27
誉满东邻朱舜水	30
太平天国将领何文庆	35
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驱者李成虎	39
著名小说史研究家蒋瑞藻	43
我国幼儿教育的奠基者陈鹤琴	47
现代著名作家许钦文	50
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朱自清	52
早期绍兴学生运动领袖何赤华	56
著名外科专家沈克非	62
著名革命活动家张秋人	66
浙江早期学生运动领袖宣中华	72
现代散文作家孙福熙	78
青年团首任书记俞秀松	81

以身许国的梁柏台	86
人民的忠诚儿子宣侠父	91
诸暨人民的好干部何文隆	97
著名革命音乐家任光	100
现代著名作家魏金枝	105
为革命献身的郦咸明	108
革命学者、翻译家胡仲持	110
上海工人运动杰出领袖汪寿华	112
无私无畏的革命战士曹素民	118
忠诚的革命者杨思一	124
无畏的新闻尖兵何云	126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郑复他	132
现代著名作家孙席珍	134
革命骏马马东林	138
年轻的钢铁战士郭大善	142
现代革命作家徐懋庸	147
无产阶级忠实的革命战士黄敬	150
在诸暨献身的县委书记朱学勉	152
党的好女儿宣华芳	158
华东二级人民英雄夏白	163
夏盖湖农民暴动首领陆阿福	167
周恩来同志在故乡绍兴	170

越国著名政治家文种

“国之梁栋，君之爪牙。”“忠而善虑，民亲其知，士乐为用。”这是于越大夫曳庸和皋如对文种的赞美语。文种善理内政，长于外交，在兴邦复国中起了很大作用，他的才能为于越人民所敬佩。

文种，字会、伯禽，一作子禽，楚国郢人（今湖北江陵附近）。春秋末越国著名的政治家。文种是位有雄心壮志的越国谋士，越王勾践兵败国破，在勾践夫妇离越去吴作人质、范蠡决定随行的前夕，于越国内假使没有一个有威望、有能力的权臣主持国政，就马上会分崩离析。正是于越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常常排列在于越大夫中第一位的文种，被大家推荐负此重任，文种自己也临危不让，坚决地说，对内政治清明，对外备战应变，土地不使荒芜，人民团结一致，这是他的责任。就这样，文种在于越最艰难危急的时刻，以身自任，度过了两年多朝不保夕的岁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一面主持国政，清明政治，一面为营救勾践奔走于吴、越二国之间，终于赢得了夫差最后把勾践夫妇与随行的范蠡释放回国的胜利。

勾践返越以后，除了抓紧重建家园外，就是如何兴越灭吴、报仇雪耻。他以此事垂询大夫计倪，计倪说，范蠡处事情明而善理内政，文种见识广阔而长于外交，伐吴大业得与文种商议。于是勾践召见文种，文种就向勾践献出著名的“九术”。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尊天地、事鬼神；第二，以财币货品厚献给吴王及他的大臣，以博得他们的喜欢，松懈他们的警惕；第三，用高价购买勾吴的粮食，以空虚他们的粮食贮备；

第四，选美女献给夫差，使他迷于酒色，不理国政；第五，向勾吴遣送巧匠，献给良材，使他们大兴土木，以疲乏他们的财力；第六，扶植勾吴国内自私自利、阿谀奉承的小人，使之当权，勾吴就会变得脆弱；第七，中伤勾吴国内忠直不阿的人物，使之受到排斥，甚至自杀；第八，发展生产，充实军备；第九，训练士兵，伺机进攻。①

“九术”得到了勾践的完全赞同，而付诸实施。文种知道夫差有大起宫殿的欲望，而会稽山中有很多原始森林，于是就派遣木工一千多人，入山伐木一年，把大量良材献给吴国。夫差非常高兴，不顾伍子胥“筑起灵台，封起鹿台”的力谏，大起姑苏之台，高三百丈，广八十四丈，在二百里范围内都可以仰望遥见，弄得勾吴道死巷哭，民不聊生。文种又深知夫差淫而好色，于是就在会稽山西翼的苎罗山下，物色到西施与郑旦二人，通过勾吴佞臣太宰嚭，献给夫差。当时伍子胥也以“夏亡以喜妹，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的教训力谏，然夫差不听，从此沉湎酒色，不理政事。

文种还亲自到勾吴，诡称于越道遇饥荒，向勾吴告籴。虽然伍子胥力主拒绝，但夫差在太宰嚭的怂恿下，将稻谷万斛借给于越。两年后，于越选择了最好的稻谷蒸熟后还给勾吴。夫差看到于越归还的稻谷颗粒饱满，要太宰嚭把这批稻谷留作种子。这样的种子当然不会发芽，因此就造成了吴国的大饥荒。

由于“九术”的实施，于越的国势蒸蒸日上，勾吴的国势却每况愈下。夫差最后又中计命伍子胥自杀。于是，于越终于在公元前472年覆没了勾吴，并且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周朝的皇帝也派人赐勾践以命号，达到了他逐鹿中

①《吴越春秋》卷五。

原的目的。就在这个时候，范蠡写信给文种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走狗将烹。越王勾践是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安乐的人。事情成功了，我们再不走，他必会加害我们。但文种不相信范蠡的这番话，范蠡毅然出走，文种却仍然留下来。范蠡出走后一年（公元前471年），勾践把文种召来，对文种说：你是一位有计谋、懂兵法、能覆灭一个国家的人物，你所献的“九术”，我只用了三术，强大的勾吴就破败了。吴、越世代作战，我的前王生前被勾吴的前王所打败，现在我希望你留下的六术，到地下去献给我的前王，以便我的前王可以在地下对付勾吴的前王。就这样，勾践仿效夫差杀伍子胥的办法，赐文种一把属镂之剑。文种仰天叹息，用这剑自杀了。这事说明勾践虽有兴帮复国的雄才大略，然也是妒贤嫉能的暴君。

文种死后，勾践将他葬在西山上。人们怀念文种，把此山改名“种山”，即现在绍兴城内的卧龙山。后来，人们还传播着这样的故事：伍子胥被夫差杀害以后，上苍封他为“潮神”。文种被害后一年，伍子胥乘怒潮把葬在种山的文种带走，从此文种也做了潮神。以后钱塘江怒潮来到时，潮前的是伍子胥，潮后的是文种。当然，这是一个神话。但人们把这两位忠心为国，最后却被各自的君王杀害的人联系在一起，说明人们对他们的怀念与崇敬。文种墓经历代修葺，至今仍在卧龙山的望海亭之下。以供后人瞻仰。

越国“圣臣”、谋士范蠡

范蠡是个知识渊博，才能出众的于越谋士。敌国勾吴大臣伍子胥曾在吴王夫差面前，把范蠡说成越国的“圣臣”，这个称号，范蠡是受之无愧的。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人（今河南南阳附近），春秋末越国著名大夫、谋士。范蠡出身贫贱，后仕越为大夫，擢上将军。他在于越最危险的时刻，随同勾践入吴，入吴前夕，他表决心说：扶持面临危险的国君，保存行将覆亡的国家，忍住受屈辱的灾难，安守被侵略的土地，此去必然设法回来，为国家报仇雪耻，这是我的责任。在勾吴二年多的俘虏生活中，范蠡含垢忍辱，每时每刻都不忘报仇雪耻，贿赂夫差身边的僚臣太宰嚭，以窥测夫差的动静，并且让他在夫差面前替勾践说好话。终于使勾践化险为夷，平安返越。

回越以后，范蠡首先为于越在山会平原上选定了一个建立城市的地址，把于越的中心从崎岖的会稽山地，迁移出来。范蠡之所以选择今绍兴城所在地建立国都，是有他的远大战略思想的。他对勾践说：你想，要立国建都，并于将来进攻敌国，作为这样一个基地，必须建立在具有宽广平坦的地形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的地方。要有这样的国都，才能建立霸王的事业。就这样，范蠡先后建筑了小城和大城。于越一代的历史和以后的二千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范蠡选择建城地址，是十分理想的。

正如大夫计倪所说的，范蠡处事情明而善理内政。他实际上是于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最重要的计划者和领导者。他告诉勾践：要兴越灭吴、称霸中原，首先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而在强敌逼境的情况下，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建立强大的军队，就必须有众多的人口；要养活众多的人口，就必须发展农业。因此，人口众多则国家安全，粮食众多则军队强盛。所以，于越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农业，增加人口。这些意见实际上就是于越的基本国策。就这样，范蠡首先领导百姓发展农业，着手开辟土地，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生产。他利用山会平原上的许多孤丘，发展养鸡、养猪等畜牧业；利用这个地区的广阔河湖网，发展水产业。把农业生产中的各个部门都建立起来。为了使农业生产有保障，他又研究季节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研究灾害天气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等问题，从中总结出许多规律性的东西。他说：“春生之，夏长之，秋成而杀之，冬受而藏之”，“八谷贵贱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夏三月之时，大热不至，则万物不能成”；“当寒而不寒者，谷为之暴贵”等等。为了观察天文现象和天气现象，以掌握季节变化和气候变化的规律，他为勾践在怪山（今城内塔山）建造了一座怪游台，高46丈5尺2寸，周围532步。这座建立于公元前490年稍后的综合性观象台，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天文台和气象台之一。

除了整顿内政、发展生产以外，他也关心军队的建设。他聘请了著名的射手，楚国人陈音，让他担任于越部队的射击教官，提高了于越军队的作战技术。他还同时配合文种的“九术”，进行从内部瓦解勾吴的工作。他在今绍兴城东建造一座土城，让西施和郑旦在这里学习舞蹈和各种礼义，然后又亲自把她们献到夫差身边去。公元前473年范蠡制定攻勾吴的作战

计划，分兵两路，直攻姑苏，乘虚而入，灭了吴国。

范蠡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公元前472年，勾践大功告成的当年，他就毅然引退，抛妻离子，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于越人们从此不知道他的行踪。勾践特地叫良工为他铸成一座金像，放在自己的座侧，与这座金像朝夕论政，以表示对他的纪念。传说他化名“鸱夷子皮”，离越到齐，治产获利千万，做了齐国宰相，后来又弃官散财，到了陶的地方（今山东定陶西北）成为一个慷慨而豪富的商人，累资巨万，但也常常散发资财以救助别人，号陶朱公。

范蠡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时势的盛衰也如此，故须待时而动，顺其自然。在经济思想上，着眼于自然循环，掌握“贵上极则反贱”的原理，《计然篇》为其代表作。

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

孙绰以文才见称于世，与许询同为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家，系一代文宗。

孙绰（314—371）字兴公，原籍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的祖父孙楚，官至冯翊太守，是西晋文学家。孙绰年少时，生活并不平静。他九岁丧父，寄身外姓，靠着母亲抚养成人。

他家居会稽，少年时与诗人许询都有隐居的志趣，对“吏非吏、隐非隐”的山涛表示不满；曾游放山水，为时十余年并作《遂初赋》以见志。他曾与文学家刁岱齿共行，孙绰在前，回头对刁岱齿说：“沙之汰之，瓦石在后。”刁回答说：“簸之扬之，糠秕在前。”他这个好讽刺别人的人，却遭到了回敬。

他开始任著作佐郎，袭爵长乐侯。后来“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补章安令征，拜太学博士，迁尚书郎。扬州刺史殷浩以为建威长史。会稽内史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转永嘉太守，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寻转廷尉卿，领著作”（《晋书·孙绰传》）。

东晋时期，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更盛，对文学的影响也更大，出现了孙绰、许询等一系列作家，他们“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玄言文学占了文坛的统治地位。这种文学在内容上是“世极违遭而辞意夷泰”，严重地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则“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传者甚少。孙绰有少数诗作写得较好，如《秋日》，

萧瑟仲秋日，飒唳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

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扶叶悲先落，攀松羨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这首诗虽也以庄子的思想作结，语言清淡，却有一定的真情实感。还有《情人碧玉歌》二首，相传也为孙绰所作。这是两首爱情诗，语言比较流畅生动，如果不是伪作，更可以证明他的诗并不都是道家玄虚的教条。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初三日，孙绰与王羲之、谢安、谢万、许询、献之等四十一人，会于景色秀丽的山阴兰亭临流嬉戏，饮酒赋诗，各抒怀抱。孙绰，王羲之等二十六人当场赋诗，其中十一人各赋两篇，十五人各赋一篇，共计三十七篇。定为《兰亭集诗》，由王羲之撰写《兰亭集序》，孙绰撰写《兰亭集跋》。孙绰著称于时的名作是《游天台山赋》。据《晋书·孙绰传》及《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孙兴公作《天台山赋》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声。”这话虽有些自负，但作者以《游天台山》为题而采取记游的形式，对自然景物的刻划生动形象，富有变化。这种写法，为后来的山水诗文开了门径，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具有它的意义的。

作为一代文宗的孙绰，也能写散文。当时达官贵人死后，都要请他写碑文，然后才能刻石。今传有《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太尉庾亮碑》、《司空庾冰碑》等。他的《谏移都洛阳疏》，敢于对垄断朝政的桓温提出不同的意见，文章也写得有理有据，是当时一篇名文。

孙绰的著作，有《至人高士传赞》二卷，《列仙传赞》三卷，《孙子》十二卷，集二十五卷，均已散佚，明人辑有《孙延尉集》。

东晋地主阶级政治家谢安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王导，谢安，皆社稷之臣也。”谢安南迁定居浙江会稽（今绍兴）上虞，步入仕途后善于处理复杂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稳定政局，使南方经济得到继续发展。特别在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更显示了杰出的才干。他曾是东晋时期与王导齐名的宰相。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大臣。谢安出身于“家门富贵”的头等世族。“少有重名”，为王导赏识。可是他并不“凭籍世资”去猎取高官厚禄。他年轻时除佐著作郎，后以疾辞官，寓居风景秀丽，物产殷富的会稽上虞，过着“优游山林”的隐逸生活。与王羲之、许询等，“出则弋山水，入则咏属文”。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初三，谢安与当时会稽内史王羲之、右司马孙绰，司左西属谢万，佛家即色宗代表支遁、高士许询及献之、涣之、元之等四十一人，会于景色秀丽的山阴兰亭临流嬉戏，饮酒赋诗，各抒怀抱。朝廷虽然多次征召，他却拒绝入仕，甚至受到“弹奏相属，继以禁锢”的威胁，他也“晏然不屑”。年逾四十方出仕。谢安步入仕途是历史的需要和时代的召唤。王羲之概括当时的形势是“今外不宁，内忧已深”，“虽秦政之弊，未到于此”，“天下土崩之势”已见端倪。时人皆期待谢安出来辅政，士大夫们互相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说：“江东人士始焉所期望者殷浩，浩既无以满众望矣，继而所望者谢安，而安卒能匡辅晋室。”时人对谢安的期望，反映了谢安是世族中的优秀人物。

从咸安元年到太元十年（371—385），谢安迅速登上了辅政的地位，成为东晋继王导以后有名的社稷之臣，即由侍中，

吏部尚书、总中书、司徒、太保、太傅，并统十五州诸军事。

谢安十五年的政治实践活动，使东晋转危为安，关键在于他实行了改革时弊，稳定社会矛盾，稳定政局的总方针，即“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统行，文武并用，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就是从地主阶级总利益出发，缓和社会矛盾，团结各世族集团的力量，使政局得到稳定，以对付多虞的局面，使东晋的政局出现了生机。

第一、实行“镇以和靖”方针，维护皇权，阻止桓温的篡夺活动，稳定统治秩序。371年面对权臣桓温“伏甲设馔”摆出的“鸿门宴”，谢安冒着生命危险，去见桓温，他从容不迫，神色自若地对桓温说：“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谢安要他还兵军镇。继而，又阻止了桓温请加九锡的图谋。桓温于373年死后，其弟桓冲“领其众”，仍然雄踞长江下游。谢安未趁桓温之死剪除桓氏集团，桓冲也“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之内相，而四方镇扞，以为己任”，都以大局为重，从而减少内耗，使上下齐心，稳定了政局。

第二、维护集权，实行内政改革。东晋社会，除了外部矛盾以外，内部矛盾所反映出来的弊端，一是世族军阀势力的膨胀，形成了军阀权臣擅政专横，集权削弱，政局动荡；二是门阀世族世袭特权，官僚队伍日趋腐朽。谢安对此实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

首先，建立“北府兵”作为维护集权统御内外的依靠，起到“以重朝权，以图中原”这样“一举两得”的作用。谢安器重侄子谢玄，组织北府兵，多募劲勇，选用良将，所以后来淝水一战中，“以战无不捷”的勇猛，使“敌人畏之”。王夫之说：“谢玄监军江北，择将简兵，六年后用之以破苻坚于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

其次，实行以才德取人，不用人唯亲。王夫之在论到谢安

时，指出他“以族盛而远嫌，不私其子弟可矣”。王国宝是谢安的乘龙快婿。但是，这位纨绔子弟“少无士操，不修廉隅”，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妓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谢安按才德取人的思想，是重贤爱才，因此也不因亲族有德才而避嫌不选。在“符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之际，他除了按骁猛选将，诸如刘牢之等，同时也因其侄谢玄“有经国才略”而命监江北军事，组织北府军，此时“人间颇有异同之论”，甚至“巷议疑其不振”。但是，谢安不为非议所难，断然“以玄应举”，有识之士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同时，谢安还在符秦大举南侵的紧要关头，以其子琰“有军国才用”，任命为辅国将军，率精兵八千，和谢玄共同御敌。谢琰、谢玄在战斗中有勇有谋，“破阵破坚”，功勋卓著。谢万是谢安之弟，此人异常简傲，并非将才，更不堪受元帅之任。可是朝廷以万为帅，率军北征。“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对此，谢安深感忧虑，一方面他“自队主将帅已下，安无不慰勉”。另方面则严肃的告诫谢万：“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可是，谢万既不爱士众，又畏敌不敢奋战，结果大败。证明谢安是知人选任而不任人唯亲的，亦不庇其亲族。这对一个门阀大族的人物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同时，谢安在用人上始终贯彻“镇以和靖”的总方针，注意不私其亲属。比如在淝水战后，桓冲已病死，荆、江二州重任委谁继任。谢安虽然知道“物论以（谢）玄勋望，宜以授之”，但他考虑到“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最后，以桓温的侄子桓石民镇荆州，以桓伊镇中流，桓石虔据豫州，使之“彼此无怨，各得所任”。

其三，经济上“除度田收租之制”。《读通鉴论》卷一四载：“太元元年（376），谢安录尚书事，除度田收租之制。度田收租者，晋之弊政，鲁宣公税亩之遗弊也。安罢之，可谓体天经以定民制矣。”废度田收租制改为计口税制，一是相对减轻税率，二是限制了随意转嫁，似乎赋役有所减缓，所以《晋书·食货志》说：“至丁未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淝水之战，是一场关系到东晋王朝存亡的决定性战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负有盛名的一个战例。谢安在这著名战役中充分显示了作为统帅的指挥才能。

谢安执政之始，鉴于前秦日渐强盛，遂功陷梁、益、樊、邓等地（今陕南、四川、鄂西一带）。为加强防御，致力协调荆扬矛盾，又遣侄谢玄坐镇广陵（今江苏扬州），组成北府兵，积极备战。太元八年（383年）苻坚大举南下，朝廷震恐。谢安则镇定而有谋略。“谢安为宰相，秦人屡入寇，边兵失利，安每镇之以和静”。特别当苻秦大军压境，次于淮淝，谢安却“夷然无惧色”，而且还邀约亲朋，与谢玄围棋于别墅时，桓冲很不理解，叹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虽遣诸不经事少年，众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在苻坚“尽国内侵”的紧急时刻，桓冲失掉信心，而谢安却镇定自若，充分显示了具有统帅的才能。结果出奇制胜，取得淝水之战大捷，继又挥军北伐，挺进中原，一度收复河南失地。《晋书·桓冲》传说：“谢安以时望辅政，为群情所归。”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到太元末年（376—396），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谢安可称得上士族中的俊杰。

唐朝诗人、越州刺史元稹

元稹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在任浙东节度使和越州刺史之职期间，也写了许多盛赞越州风景秀丽，城市宏伟的诗篇。同时大力提倡兴修水利、关心农事；实行均田赋，减轻了民众的赋役负担，曾广为越州民众称颂。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市）人。早年家贫。九岁能属文，十四岁明经及第，二十四岁举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敢直谏，为当政者所忌，出为河南尉。后任监察御史，奉使东蜀，劾奏违法官僚，平雪冤狱，名动三川。得罪宦官权贵，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穆宗即位，召为膳部员外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长庆二年（822），升任宰相，同年罢为同州刺史，后迁浙东观察史和越州刺史。大和三年（829），入朝为尚书左丞，不久，又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卒于任所。

元稹在长庆三年八月至大和三年九月（823—829）任尉东观察使（浙东道领有越、衡、婺、温、台、明、处七州，越州是道治所在地）和越州刺史的七年中，做了不少有利于浙东，特别越州人民的事。

大和三年，越州大风海溢，海水冲塌海塘，造成田地斥卤，元稹即动员山阴、上虞两县群众抢修海堤，改良土壤。宝历七年元稹还命吏课七郡人备筑陂塘，春贮雨水，夏溉旱苗，还动员上虞县永丰、宁远、新兴、孝义等乡之民割己田兴建夏盖湖，周围一百〇五里，蓄白马、上妃两湖之水以防旱；旁列三十六沟，提防之制，趾广二丈五尺，上广一丈，高一丈，塘